



《東西史學》創刊詞

Axel Schneider, 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
Leide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Vienna

二十一世紀初期，歷史已恢復了在其思想話域中的中心地位。但是關於過去的討論已不再局限于歷史事實的探討，這種討論更關注的是如何來接受並且構造我們的過去諸問題。這種討論的目的在於了解我們通過哪一種方式給予我們的過去一定的意義。由於這個原因，探討史學與歷史思想的人已不僅僅是史學領域的專家，關心這個問題的是史學界的全部加上對此感興趣的所有知識分子。史學像世界萬事與所有的人一樣，也同樣處在所謂全球化過程中。但當其他領域的知識創作已經被國際化的時候，史學領域在適應全球化時面臨著特殊困難。不言而喻，編纂歷史的傳統比民族國家的存在時間更長。但可以說，民族國家自存在以來，編纂歷史跟構造與探討國家認同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長期以來，史學為民族國家的建設服務，因而一再能獲得國家經費上的補貼。它的存在離不開對民族國家的解釋與討論。如果全球化不僅僅是經濟領域內的一個過程，而涉及到人類的生存的諸方面，民族國家是否有必要存在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問題。而否定民族國家的必要性使史學的任務需要重新做出定義，因為它的出發點與它的對象隨之有所改變。史學界將來是否在創造超越民族認同過程中去完成它的任務？

抑或史學界將要在保持關於過去民族國家的記憶中爭取它的正當性？我們有沒有可能把人類作為我們的認同對象？史學家將來是否應該關注更小一點的地域，去寫某個地方的，某個城市的，或某個村子的歷史？這些尋根式的研究長期以來為眾人所忽視而現在好像已經成為唯一的有正當性的認同對象。這是歷史與回憶的討論最近幾年特別活躍的原

因之一。關於歷史與回憶的討論反映歷史知識的生產者與歷史知識的消費者雙方對他們過去所持的共同的歷史觀的懷疑。宏觀歷史的大敘述

如果失去它的說服力，個人的回憶就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個人的回憶也是史學家寫沒有留下歷史資料的歷史的唯一的根據。研究的對象越小，史學家越需要口述史來幫助他了解過去。全球化的過程同時也是話域全球化的過程。而話域全球化包括在史學與歷史思想的領域之內對特殊性与普遍性重新加以定義。如果說以民族國家為出發點的史學集中地講述一個民族的特殊歷史，那麼超越民族國家的全球化史學是否將要著重談歷史的普遍性問題？它要是不講歷史的普遍性，那麼它只能研究不屬於民族國家範圍之內的歷史的特殊性，即地方史的特點等問題。

但是誰有資格來對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間的關係加以定義？誰有資格說明普遍意義是什麼？到今天為止，史學界由歐洲經驗所占領而由以歐洲歷史為背景的史學家所支配。這些史學家往往在不了解非歐洲歷史的情況下把歐洲歷史的模式當作有普遍意義的。但如果我們把歐洲歷史看作是有普遍意義的，這就意味著話域的全球化將壓倒歷史經驗的多元性而引起歷史思想的貧窮化。它將要減少歷史的多种寫法而想把關於世界史的不同概念統一在來自歐洲的價值觀之下。

能看到這種支配與被支配關係的人一般不是支配者而是被支配者。不研究歐洲歷史的專家以及來自歐洲以外的歷史模式與傳統的歷史學家往往不肯接受歐洲歷史學的支配，因而也不肯接受由歐洲價值觀所支配的全球化話域。他們希望話域的全球化能以多元化思想為主導。這就是說，歷史學家需要在了解本國的歷史之外研究與了解他國之歷史。而研究歐洲歷史的史學家應該意識到不以歐洲歷史為背景的同事對他們研究範圍之外的歷史一般會特別有興趣。他們對歐洲歷史與史學往往超過歐洲歷史學家對非歐洲歷史的認識。

雖然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的史學家本可以為自己的史學傳統之豐富和持久而驕傲，不用接受來自歐洲的歷史編纂方法，但是他們一直積極地吸收西方史學的理論與哲學來維新中國的歷史學。這種開放的態度跟歐美史學界普遍的無知或一知半解的狀況產生明顯的對立。當然，歐美史學家也有人對像非洲那樣的非歐洲式歷史感到有興趣，但他們在一般情況之下主要是想把非歐洲歷史納入到本國的歷史當中，因而不一定會注意到非洲等地區怎樣去寫自己的歷史。對非洲來說是這樣的，對像亞洲這樣富有持久的史學傳統而給我們留下了很豐富的史料的國家來說更是這樣的。可以說世界上所有的不按歐洲式的史學編纂法寫自己的歷

史的地區或國家都需要我們認真去研究。這不僅僅是我們的義務，我們同時也應該意識到這樣下去的話，歐洲中心主義的史學家將失去一個考驗自己的歷史觀的重要機會。忽略了非歐洲式的寫歷史的傳統等于是失去了一個開闊眼界重建史學的重要機會。當前我們大家都不可避免地在學會過一種跨邊際的生活。在這樣的世界如果要取得成績的話，必須有了解他人的本領，而在史學這個領域之內這等于是說，世界史只能是各種各樣的、按各種各樣的寫歷史的傳統而寫的歷史的總合。這種對歷史知識的全球化會產生一種新的世界史觀念。這種新的觀念提醒我們在還沒有了解到世界史的多樣性之前最好不要談世界史的同一次性。

《東西史學》就是為這個目的而新辦的一個雜誌。它的重點在于研究怎樣寫歷史，而不在于研究歷史本身。它注意到寫歷史的方法問題，同時也歡迎關於史學理論與史學思想的來稿。《東西史學》將為討論不同的寫歷史的傳統而提供論壇。它準備發表的文章可能採取一種比較的方法，但是如果來自世界各國與地區的史學家不想做比較史學的研究也可以在《東西史學》上發表學術性文章使我們大家加強互相的了解，讓我們互相補充而最後通過認識他人而更加認識自己。

因為有了這樣一個目的，所以《東西史學》是一種多語言的雜誌。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史學家大概都會感覺到，凡是用英文去寫文章，自己發揮全部智力的可能性會受到一定的限制。特別在創造一種新的、他人未曾提出過的、需要一套新詞匯的想法時，更是如此。但我們也都知道，只有用英文去發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它們才有被推廣的可能。英語已成為世界學術交流的主要工具。它作為一種幫助學術國際化的工具的同時，又讓很多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學者不能或不願意說出自己可以說得出的話。《東西史學》由此從一開始起被設計為一種真正的多語言的學術雜誌。《東西史學》的編輯歡迎世界各個地區的作者用各種語言來稿。凡是編輯能找到兩個懂這種語言的人對文章的學術性進行評審，這個稿子就有被發表的機會。每篇文章都有英文和中文的概要。而如果編輯得知有一部分讀者因為看了概要而想看全文，編輯部會盡量為讀者提供方便，把文章翻譯成比較普通一點的語言。《東西史學》的編輯特意想請亞洲來的學者為本雜誌寫文章。他們往往在本國雜誌上發表的論文不少，但不能積極地參與世界上關於史學與歷史思想的討論。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語言方面的。《東西史學》作為一種多語言的學術性雜誌希望能夠改變這種狀況做出一定的貢獻。要是想創辦一種真正多語言的雜誌，最好的、並且相當方便的一種辦法是以網上雜誌的形式出版它。這是《東西史學》為什麼是一種網上雜誌的最重要的原因。網上雜誌最能

發表不同語言、不同字形的文章，但我們這個網上雜誌跟其他學術性雜誌一樣，在它的編輯部周圍有一批專家幫助編輯對來稿進行評審，使它在學術質量上能達到一個相當高的、能比得上傳統學術雜誌的水平。有了這樣一個質量上的保證，網上雜誌還可以進一步去利用網上有利的技術條件去實現傳統雜誌在一般情況下實現不了的，即給每一種語言、每一種字形、不同語言、不同字形結合起來的文章予發表的機會，使史學界的討論能迎接全球化過程在它面前設立的挑戰。

如果史學真正地又回到世界話域的一個中心地位，那麼除了史學家之外，其他領域的學者對怎樣寫歷史的討論也會產生興趣。由於這個原因，《東西史學》不僅僅為研究史學與史學思想的歷史學家服務。他認為世界萬事都有其歷史根源，人生的各個方面都有其歷史的一面。這就要求史學界跟其他的注意人生的歷史性的學科建立更密切的聯繫。它們雖然不專門研究歷史，但是也是離不開人生的歷史性而做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研究怎樣寫歷史的史學家已意識到有必要跟政治學家和社會科學家討論他們的研究成果。史學家也迫切需要媒體專家來支持他們去了解當前媒體是如何影響歷史知識的普及與傳播的。同時我們希望能夠更多地看到世界各個國家與地區的史學家寫的關於本國史學傳統的文章。但地域專家也應該提出自己的看法，因為他們作為外來者對他國史學進行分析，也可以產生出重要的見解。

《東西史學》是德國海德堡大學 2001 年 5 月組織的一次關於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思想的研討會的一個產物。這個會議是海德堡大學漢學系當代中國學的施耐德與魏格林兩位學者合辦的第二次關於中國史學的國際學術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國的專家。他們以及所有的回復征稿的學者的反應對會議的組織者和創辦雜誌的幾個同事是一種巨大的鼓舞和支持，使他們更有信心去找一個能出版《東西史學》雜誌的出版社敢於出版這樣一種多語言、跨學科的網上雜誌。創辦者為終於能找到像 Brill 這樣一個很有名氣並在技術方面很有經驗的出版社而感到十分高興。同時也想向蔣經國基金會提供經費方面的支持而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謝。

那麼，因為《東西史學》雜誌的來源如此，第一至第三期將集中地介紹以上所說的海德堡會議的文章。特別是第一期，除了海德堡會議的文章之外，沒有其他方面的文章。這就是說，除了一篇專門講理論問題的文章之外，所有在此發表的論文都涉及到中國現代史學之問題。編輯部這樣決定來創辦《東西史學》不僅僅有其現實的原因。更重要的是，編輯部認為最近幾十年來，中國史學方面的研究已創造出不少積極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國的史學家曾經起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作用，國外的漢學

家在這個領域之內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現在在中國也好，國外也好，已有相當大的一批學者專門對中國現代史學進行研究。正因為如此，編輯部感到有必要引起不僅是中國專家而且是研究史學的所有同事對這些研究成果的關注，同時希望不研究史學的中國專家也會對史學這個學科產生一定的興趣。

除此之外，在《東西史學》雜誌創辦時首先介紹中國現代史學還有其他原因。這個原因就在于中國史學不僅僅對中國知識界歷來有重大影響，中國史學也一直表現出對擺在它面前各種各樣的挑戰的出色適應性。二十世紀的中國史學能夠不斷地、很靈活地經受外來影響，特別是西方思想給它帶來的各種考驗。當然，想了解中國現代史學的變遷與發展，則一定要去學習中國古代史學傳統。但了解外來的有關史學的思想與理論以及它們對中國史學所發生的影響同樣也有其重要性。其中外來思想通過哪一些渠道而轉入中國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因為通過這個問題可以把中國史學看成是不同史學互相接觸、互相補充的榜樣。《東西史學》的第一期將集中地發表有關東西史學相互補充的文章，并把中國現代史學作為這樣一種榜樣來介紹。這些文章既有中國史學家自己寫的，又有國外的中國專家寫的。除此之外，還有一篇文章向中國史學提出一個中國史學家自己還沒有提出來的問題。寫這篇文章的目的在于考察有沒有可能從外面向中國史學提出一個理論性問題而引起更廣泛的討論。這當然是相互補充的另外一個渠道。看起來，參加會議的中國史學家對這樣一個做法既感到陌生又感到好奇。

《東西史學》的創辦者希望通過介紹中國現代史學來鼓舞我們的讀者和那些支持我們的工作的朋友著手進行對不同史學傳統和史學思想的研究。這將使史學家們在反思自己的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豐富自己對不同的史學傳統的理解。這正是《東西史學》作為一種多語言、多地區、跨學科的雜誌希望為迎接全球化給歷史學界帶來的挑戰而做出的努力。